

对话：找出方法 一起生活

历史上发生过四次基督信仰与中国之间的相遇，呈现极为戏剧性的故事。在中国的少数基督徒至今仍在承受这过去失败的负面后果。不过，近二十五年来，中国人民对基督信仰所展现出来不断增加的兴趣，是前所未有的事。

基督信仰与现代中国之间的第五度相遇能成功吗？我们一方面只能臆测，一方面也很清楚，在历经多次失败之后，只有藉著坚持下去的对话，基督信仰才能深植中国人民的心里。双方都必须让自己从过去的创伤解放出来。教宗本笃十六世从开始他的宗座职务，就已经呼籲对话是福传的基本要素，是他为唯一的中国教会所推动的：既非「爱国」也非「地下」，而是单纯的中国天主教会。中国当局会同、而在诚信之中加入对话吗？

>>梵二大公会议是促进对话的先驱

很久以前，教会与世间有了纷争，之後处於对立的情况。自从梵二大公会议以後，教会变成提倡对话的先驱。1937年因为史达林设法迫害教会，教宗庇护十一世颁布了通谕「神圣救主」(Divini Redemptoris)。历史的情势让这位教宗很快说出斥责的重话。数年之后，在中国文革之前与文革期间，也有同样的情况。教宗庇护十二世在1958年他的通谕「宗徒之长」(Ad Apostolorum Principis)中，也写下斥责的话，时间就在中国当局未经教宗任命而迳自祝圣两位主教之後的十天。这些都是世界上国与国间对立的一般情况，日後被称之为冷战。

然而随著历史演进，新的情况逐步形成。在1963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写了「和平於世」(Pacem in Terris)，强调教会对于世上各种不同意识型态是开放的。那的确是教会的一种新的声音。到1964年8月，在梵二的第叁期会议之初，教宗保禄六世写了他的重要通谕「祂的教会」(Ecclesiam Suam)，让「对话」这词彙第一次出现在教会官方文件。这意味著教会历史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样的呼求对话，回应了梵二的重要发现，就是教会需要与世界进行对话，这



“与中国大陆教会合作、并与当局接触时，我们依循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指引：从事对话，推动修和，建立合一。”

也是对於演变中的全球新情势的一个回应。教会也希望跟著时代前进，继续走对话的路。当各国、各宗教、各文化都似乎发现了需要对话的时候，教会也已经从教宗若望二十叁世开始提倡了。

>>对话：福传的一个基本要素

梵二大公会议期间，教会渐渐瞭解到与世界对话是福传的基本要素。这是教会从其自身使命中得到的新的洞察力。福传不只是传播福音而已，而是先假定这传播的基本方面，传播者愿意学习并尊重接收信息者，尤其是，假如我们的听众不但非我们同类，而且几乎就是教会的敌手，他们很有可能反对、且立即以对立态度排斥福音的内容。即使这样对立，也不需要演变成彻底的衝突或不和，反而给双方一个挑战，去超越对立，找出方法，一起生活，甚而为共同的利益一起工作，而不背离各自的特性。这种对话的结果就是和平而有效的共存，比起对立衝突的负面后果，有著一定程度的真正的进步。这时从历史眼光来看，全世界，包括教会在内，就是

在学习中进步，而不走回头路。这样日复一日，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过程，会越来越清楚地发出信号，需要我们在人类互动的每一个情境中参与对话，在各宗教、各文化、各国之间，在彼此的欣赏当中对话。

>>四十年罗马推动与中国的对话

试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磨合与对话，已经是罗马宗座的优先工作，由保禄六世开始，若望保禄二世继之，并延续到目前的本笃十六世。1970年，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的前两年，教宗保禄六世已经在教廷国务卿 Casaroli 枢机主教陪同下、路经香港时，对中国及其人民发出关爱的言语。同年他还请求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FAO) 承认中国为会员。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他长期的宗座职务上，表示了与中国对话的愿望，令人瞩目。他排除一切困难与挫折，迴避所有对立的情况。他默认了一件事，是中国向来未曾从法、英、日本等过去帝国所获得的，就是他为教会可能在十九世纪犯下的错误，公开向中国道歉。这样

的对话，对中国是多麽不可多得！然而，中国却保持缄默，至今未做有效的回应！针对宗教自由在中国被否定的状况，纵使教会极感不满，教会仍然选择不选择与之对立。史上头一次，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1月召集中国谘询会议，具体讨论这方面议题。专家们的忠告很清楚：与中国保持对话而避免对立。教宗甚至在他对中国教会的牧函中(2007年6月)更清楚地重複这点。他的信息本质上包括：凡是现在倡导与中国对立，则疏忽了四十年来几位教宗的前导，而使其与中国已经成就的建设性对话之路大受挫折。

>>在中国当政者与教会之间的对话

在我们以姊妹教会相称、与中国大陆教会合作、并与当局接触时，我们依循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指引。他的牧函可以摘录为叁点：从事对话，推动修和，建立合一。几十年来，中国教会不幸分

歧成为两个团体。他们各自选择自己的路，以求在複杂而暧昧的大陆情势中生存，而仍忠於其信仰。我们相信，双方都极尽忠诚并与普世教会合一。我们但愿能减低其内部的紧张，鼓励在两个团体间做联繫，而尽量避免对立。

这项工作很微妙而吃重，首先意味著在海外的教友要与两边教会团体对话，要聆听两边并以「爱与真理」试著瞭解两边的团体。如果有人选择只与一边或另一边联繫，其言行便与教宗的指引相左。我们不可能期许历经痛苦而且现在还备受困扰的大陆教友突然能从过去的对立态度释怀，进而开始对话的言语。我们也应该十分理解他们今日所受的困扰就足以使他们肯定自己的对立态度。当未受其苦的人来召唤他们要开放、要进行对话时，很可能激怒他们，这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这并不构成我们海外的人因此而肯定他们对立态度的理由。那样只会确定既有的痛苦，而且削弱了教宗希望对话的呼籲。我们应该反过来请他们注意、意识到教宗一再强调的、我们信仰本质上不可协商的一面。既然教宗本笃十六世牧函所强调的重点是对话，就是有著一层「在对话中对立」的含意。

就是针对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必得在与当局对话中，寻求一种「暂时协议」。断章取义是极严重的扭曲，这样会将整封信变成「呼求对立」，这就背离了原信由衷呼求修和、对话、合一的精神与意义。今天若要鼓励中国的教友去讲「神圣救主」一类的过时的对立言语，就变成一种时代的错误，只怕会造成教会内部的分歧，并导致中国教会与当局走入对立与仇恨更深的死胡同。

我们必须试著瞭解那些符合教宗愿望，以对话方式与当局工作，而又保持与圣座合一的人。他们吃苦头，却遭到对他们的认真意图误判之人的辱骂。遇到他们当中有人因为强加於他们身上的任务、而陈述似乎质疑教会基本原则的一份文件时，这或许使我们感到震惊。这些人显然以为他们在如此不自由情况下，是情有可原的。我们若在这类媒体事件上，对我们的弟兄做出草率的判断，会使我们内疚，也於事无补。反过来，我们应该透过亲身接触和对话，努力澄清事情。只有坦承的与教会内的两方面沟通并谅解他们，才能消除矛盾，而奏效。

这样，才能从看似无望的分歧，形成一个「基督徒的统一战线」，不与当局对立，也绝不放弃我们的特性，而朝向对话，为各自的特性发展出一种「暂时协议」。这样，才能造成新局面，以取代过去的对立和衝突。坦诚对话、解决争端、而不鼓励对立，显然有很高要求，才更能符合基督信仰。对话则增进；对立则破坏。

>>要中国保持对话的挑战

中国与教会陷入过去长达叁个世纪的对立，被前一世纪的通谕「神圣救主」激怒、而到文革时期达於戏剧性高峰。这对立使得双方互不信任，他们不靠努力是无从解脱的，而这就是需要对话的时候。中国当局也有其内部分歧，而采不同的宗教策略，这事实使情况複杂化。甚至今天有些官员还以文革时期的说法来论宗教。而其他人士则提倡建立和谐的社会。这些声明互相矛盾。很难想像当局如何承担得起内部分歧，当其国内社会不安又如此频繁！每次地方当局打压教会就造成潜在不安的温床。政府若采用更合理的态度解决教会问题，就会发现教会其实是建立和谐社会的伙伴。

遗憾的是，海外有人煽动对立，给了这些地方官员继续打压对立的轻易藉口。即使这样，我们希望那些仍然选择对立的人不再阻碍遵循教宗走向对话与合作的人。从中国，我们预期宗教可望更自由。同时，在现存的有限自由内，有更多幅传的可能，会比目前所见的情况好些。让我们支持正在进行的福传计画，而不加以阻碍。

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牧函以及对话的建议，是教会的贡献。中国的无神论集团，如果想把国内宗教自由的情况带到国际可以接受的层次，就拒绝不了这教会的贡献。当局对基督信仰的认可，以及教会在中国的团结，两者都可能成为历史的突破点，也就是：基督信仰与中国之间的第五度和最後丰硕的相遇，会给社会与教会带来非常正面的福祉。

■韩德力神父/圣母圣心会

(此文取自《基督信仰与中国之间的第五度相遇，只有坚持下去的对话才能步向成功》之部分文章)